



昆仑文库

日本右翼
历史观
批判研究

王向远 著



昆仑出版社

日本右翼历史观批判研究

王向远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右翼历史观批判研究 / 王向远著. - 北京 : 昆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 - 7 - 80239 - 211 - 3

I. ①日… II. ①王… III. ①政治 - 研究 - 日本

IV. ①D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9822 号



日本右翼历史观批判研究

著 者:王向远

责任编辑:张良村

封面设计:李 戎

责任校对:焦金仓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c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A5

字 数:330 千字

印 张:13.125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239 - 211 - 3

定 价:3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2015年6月作者于自宅书房(摄影: 刘晓芳)

作者简介

王向远, 1962年生, 作家、翻译家,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著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2007年版)及各种单行本著作24种(含合著5种), 独立发表论文200余篇, 著作(非重复字数)500多万字; 译有《日本古典文论选译》(二卷四册)、《审美日本系列》(四种)、《日本古代诗学汇译》(上下卷)等日本古今名家名作共约300万字。

前 言

本书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历史观问题。全书的关键词首先是“右翼”。

什么是右翼？这是一个乍一想很简单、再一想很复杂的问题。

说“右翼”，就要连带说到“左翼”。“右翼”连同“左翼”一词源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分别指坐在议院右侧议席上的具有保守倾向的人士（相对的是所谓有激进倾向的“左翼”）。也就是说，法国的“右翼”指的是议会中的由政治倾向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势力或政治派别。到了19世纪后期，特别是20世纪初之后，随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左翼、右翼的含义发生了显著变化。反资本主义体制的共产主义思潮及社会势力被称为“左翼”，具有激进的、革命的特征。“左翼”信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反传统主义，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与“左翼”相反的“右翼”倾向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左翼”和“右翼”的基本含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右翼的这种对立一直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整体左翼化，由于不允许反

对党及反对势力的存在,所以作为与现有政治对立的“右翼”几乎不能生存。到了198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总体上向保守化方向发展,保守主义政治家纷纷登台执政。1990年代初期以后,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瓦解和东西方“冷战”的基本结束,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左翼”力量迅速削弱,“左翼”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基本完全融入资本主义民主议会体制,而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左翼思想也基本处于消解状态。因此可以说,199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整体保守化乃至“右倾”化。在这种整体保守化、右倾化的新的格局中,传统的“右翼”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右翼”是保守化、右倾化的极端者,与之相对的是广义的“右派”,或称温和保守派、正统派。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传统“左翼”的失落,而将当代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势力全都笼统地称为“右翼”,从而将“右翼”的概念普泛化。^①一旦将“右翼”的概念加以泛化,也就等于解构了“右翼”概念,使它失去了作为一个概念的学术价值。总体上说,无论国际政治、国际思潮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变化,“右翼”作为一种言语与行为暴烈的极端势力,都以行为排外、反共、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传统主义为基本特征,我们应将这一部分极端势力称为“右翼”,应把这些极端的思想与行为作为衡量“右翼”的基本标准。换言之,我们应该综合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意识形态等多种角度全

^① 2005年8月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研究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书,从普泛化的右翼概念界定出发,将战后日本的政界、财界、文化界的主流保守势力统统囊括到“右翼”范畴中,是颇值得商榷的。

面地衡量“右翼”，而不能以“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纯意识形态标准来看待和划分“冷战”后的“右翼”。假如只是从纯意识形态化的“右翼”概念来界定和研究右翼问题，难免重蹈“冷战”时期常常发生过的那种“左翼”与“右翼”各执一端的意识形态论争的覆辙，从而削弱研究的客观性与学术性。注意到这一点，对于研究当代日本右翼问题尤其重要。

以上将“右翼”界定为“言语与行为暴烈的极端势力，以排外、反共、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传统主义为基本特征”，这一界定实际上触及了“历史观”问题，因为“传统主义”本身属于历史观的范畴，而“排外、反共、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与历史问题密切相关。这就涉及本书的第二个关键词——“右翼历史观”。

对当代日本右翼问题的研究而言，“右翼历史观”是一个核心问题。

由于日本历史的特殊性，当代日本右翼还有一个不同于一般右翼的显著特征，就是对日本国家历史乃至亚洲及世界历史有着一整套看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日本右翼历史观”。如果不从“历史观”的角度，仅从现实政治立场、从现有意识形态上判断“冷战”后的日本右翼、左翼，往往不得要领。譬如，传统的左翼是信仰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然而日本的共产党作为一个左翼政党，在1997年9月的日共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将“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实行民主改革”作为党的路线，将自己纳入资本主义议会体制中；再如，传统右翼的特点之一是反共。然而，“冷战”结束后，可以说西方国家（也包括日本）的绝大多数国

民都不赞成共产主义乃至采取反共立场,但我们不能因此做出整个西方世界、整个日本国民都是“右翼”这样的判断。又如,战败后的二三十年间,日本的左翼与右翼尽管出发点不同,几乎都有反美倾向,但到了1990年代后,日本的右翼既有反美的,更有亲美的,因而仅以是否反美来区分左翼右翼也已不可靠了。总之,从现实政治立场、从现有意识形态上判断右翼左翼已经不可靠了,这并不是说日本的右翼弥散了、消失了、无从判断了。相反,1990年代后,日本右翼以战后几十年间前所未有的强势整合起来,凸显出来,而整合他们,将他们统一起来的共同要素,就是对日本历史及亚洲历史问题的看法,也就是右翼历史观。因此,在当代日本,衡量右翼最可靠的“标准”是右翼历史观。换言之,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右翼人士、一个团体组织是否为右翼团体、一个政党是否为右翼政党,首先要看他们的历史观。而最有能力表述“右翼历史观”的,又是那些“知识右翼”,即右翼学者、文化人。因此,研究当代日本右翼,就要研究其历史观,而研究“右翼历史观”,“知识右翼”又是关键。

于是,“知识右翼”,或称“右翼文人”,就成为本书的第三个关键词。

在日本,由“右翼”到“知识右翼”的发展演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古代的“原始右翼”,是当代右翼历史观的胚胎与原型。公元7世纪日本天皇制国家确立之初,通过天皇敕命编纂的为皇统寻根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形成了以皇道为中心的神道教的基础观念。进入中世纪后,随着神道教特别是以神社为

中心的“神社神道”的发展,“皇神之道”被神道教普泛化为天地宇宙的根本原理,表现出日本优越论的观念。进入江户时代(近世)后,皇国观念具备了对抗大陆中华文化、伸张日本历史文化独特性的自觉意图,并且被系统化和理论化,明确形成了日本至上、日本中心、日本优越的历史观,可以统称为“皇国史观”。到了江户时代末期,则出现了将日本的“皇神之道”推向大陆的对外侵略的构想。这些皇国史观的鼓吹者还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右翼,但却为近现代右翼奠定了思想基础,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右翼”。

第二阶段:近代的“战争右翼”,是在对外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严格意义上的右翼。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逐步实施,日本民间出现了两股右翼势力。一股是“思想右翼”,通过将传统皇国观念、近代西方的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观念、“大亚细亚主义”相结合,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对侵略扩张的必要性、可能性进行论证,并对民众与政府施加影响。另一股是“行动右翼”,势力以其行动性为主要特征,他们组织起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右翼团体组织,都标榜反共、“忠君爱国”、“国家改造”、天皇主义、国权主义、大亚细亚主义,都鼓吹日本要与俄国等列强争夺在亚洲的霸权,并要打入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从而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盟主”。他们立足于民间的、在野的立场,采取种种实际行动,使用种种手段,一步步推动日本军国政府的对外扩张。这两股右翼势力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相辅相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战争右翼”。

第三阶段:战败后的“运动右翼”,是战后民主体制下存在的

以尊皇、反共、反体制为特征的右翼势力。主要运用集会结社、街头游行、示威、集会、暴力、恐怖活动等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作出反应。由于“运动右翼”将全力投入现实斗争,对历史问题远不如“冷战”后的右翼那样关心。而且由于刚刚战败,社会上的反战气氛较为浓厚,除了林房雄等战前的老右翼外,“运动右翼”对侵略历史大都没有表现出露骨的翻案意图。一些右翼团体的头面人物一方面称战争不好,另一方面又称日本的战争是迫不得已的,日本有责任,别国也有责任;或称是日本大多数国民支持战争,才将天皇卷了进去,因此天皇没有战争责任。同时,战败前的少数旧军人、老右翼也开始为侵略历史翻案。如1952年田中证明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真理的审判·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出版,1963年代的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登场,1972年原关东军参谋瀨岛龙三在美国的大学开办为“大东亚战争”正名的讲座等。这些基本是极少数老右翼分子的孤立作业,未成大气候。

第四阶段:“冷战”后的“知识右翼”(右翼文人)。是由右翼文化人为主体的、以历史问题为指向的右翼势力。1980年代后,随着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日本政界出现了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在政治军事上与他国平行的“普通国家”论与“国际贡献”论。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国际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及东西方“冷战”基本结束,日本的左翼力量大为削弱,在政界“新保守主义”势力占上风,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在上述情况下,右翼的组成、指向、活动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侵略历史翻案,使日本国民从所谓“自虐史观”中摆脱出来,从而成为堂堂的“普通国家”,成为右

翼活动的新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财界、政界保守势力的支持与媒体的配合下,由大学教授、学者、作家、评论家、著名记者等组成的“知识右翼”(或称右翼文人)迅速崛起,通过著书刊文、集会演讲、媒体炒作等种种方式,沸沸扬扬、大张旗鼓地宣传,兜售右翼历史观。他们从各个不同侧面全面为侵略战争翻案,使右翼历史观由分散到整合,由潜流到狂涛,变本加厉,步步升级。到了1990年代后期,右翼历史观实现了教科书化,同时通过漫画、通俗读物等现代媒体进入普通国民视野,逐步大众化与普泛化。右翼历史观的弥漫与扩散在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知识右翼”为载体的日本右翼历史观认为:日本是世界独一无二、万邦无比的“皇国”、“神国”或“皇神之国”,日本的历史是值得日本国民自豪与骄傲的伟大历史,历史上日本人的所作所为都有充分的合理性。在对外关系方面,古代的倭寇不是侵略,而是“海外雄飞”的壮举;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并试图进一步占领中国,是对当时世界大势的英明判断;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不是侵略的历史,而是确保自身的民族独立,并解放亚洲的历史,“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打破了传统的“中华秩序”,帮助朝鲜摆脱了中国帝国的控制;“日俄战争”是亚洲有色人种战胜欧洲白人的战争,鼓舞了亚洲民族解放的勇气;“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为了保护日本的正当权益;“日中战争”(七七事变及全面侵华战争)是中国方面蓄意挑起的;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是中国人的虚构;“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为了突破国际封锁所进行的迫不得已的战争,是“虽然失败但无怨

无悔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促进了亚洲各民族在战后的独立；战后英美战胜国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东京审判）是复仇性的不公正审判；战后在左翼势力的控制下，日本人被迫接受了三种历史观——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史观”、苏联的“帝国主义战争史观”和中共的“抗日战争史观”，这是一种认定日本有罪、日本负有战争责任的病态的“自虐史观”，必须加以克服。

对于这种右翼历史观，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都有做过一些评述、研究批判。在日本，对右翼历史观的批判研究主要集中在田中正明等人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藤冈信胜的“自由主义史观”、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小林善纪的《战争论》等四个有代表性的、在日本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右翼历史观。针对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日本的学者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吉田裕、笠原十九司、津田道夫及学术团体“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等，编纂出版了若干资料集，写出了大量论文和若干研究专著，对右翼文人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提出了有力驳斥。特别是“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编《南京大虐杀否定论的十三个谎言》（柏书房 1999 年版）和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最有概括性，津田道夫的《南京大虐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社会评论社 1995 年版）的理论剖析最为深刻。在“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研究方面，主要的论著有藤原彰、森田俊男编《近现代史的真实是什么——藤冈信胜“历史教育、和平教育”论批判》（大月书店 1996 年版），“反天皇运动联络会”天野惠一编著《自由主义史观解读》（社会评论社 1997 年版），松岛荣一、城丸章夫的《自由主义史观的病理》（大

月书店 1997 年版),永原庆二的《“自由主义史观”批判》(岩波书店 2000 年版)等。对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批判研究,则集中体现在“‘教科书的真实与自由’联络会’编辑的论文集《彻底批判〈国民的历史〉》(大月书店 2000 年版)。此外,大日方纯夫、山田朗、山科三郎、石山久男合编的文集《你们能在战争中死吗?——小林善纪“战争论”批判》(大月书店 1999),“孩子与教科书全国网络 21”编辑的《能把这样的教科书交给孩子吗》,分别对小林善纪的《战争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做了批判研究。

中国学术界,近几年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日本右翼问题的研究成果文章。2001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旅日学者王智新、刘琪合著的《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将亲身见闻与史料运用结合起来,揭露了右翼历史教科书问题的黑幕。2002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分专题对日本右翼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做了分析,揭露了右翼教科书对历史真实的歪曲。同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研究》,是我国第一部从不同角度批驳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论著。到了 2005 年,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先后出版了三种日本右翼研究的著作:是年 6 月,昆仑出版社出版了王向远的《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以战后右翼文人的言论著述为中心,首次对右翼言论做了系统的剖析与批判;7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立祥的《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将“日本右翼势力”做了广义的

界定,把“保守派”势力列入右翼范畴,而以日本政界的保守势力及右翼势力的评述为中心;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步平、王希亮合著的《日本右翼问题研究》,以日本右翼团体为中心,充分运用日文材料,系统梳理了日本战前战后日本右翼团体形成演变及其活动。此外,还有一些相关论文和著作,多少涉及日本右翼及右翼历史观问题,不遑一一列举。

本书题为《日本右翼历史观批判研究》,将批判研究的重点与中心置于上述第四阶段的日本右翼,即“冷战”后的“知识右翼”上面,旨在对当代日本右翼历史观进行系统而有重点的批判研究,既要找出右翼历史观的发展演变的轨迹,更要对右翼历史观的代表人物与典型言论加以个案剖析。本书依照这一宗旨谋篇布局,基本思路和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研究日本右翼历史观形成的根源与背景,对右翼历史观的古代源头、近代根源、战后复活、“冷战”后猖獗与扩散的历史轨迹加以厘清,为以下各章铺垫出深度背景。

第二章至第九章,对日本战败后特别是1980年代后右翼文人关于历史问题、战争问题的言论进行个案研究,是全书批判研究的重心部分。这些个案的批判研究的对象包括: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使战后日本右翼历史观死灰复燃的老牌右翼分子林房雄;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系统地为侵略战争辩护的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有以大量散布右翼极端言论而知名的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和关西大学名誉教授谷泽永一;以批判所谓“自虐史观”为由,组织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鼓吹“历史教育改革”、宣扬军国主义史观的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从宗

教的角度神化天皇及天皇制、从法律的角度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法学博士、自由撰稿的著名学者小室直树；最早着手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实、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松井石根鸣冤叫屈、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公正性的民间右翼文人田中正明；通过著书、演讲、组织团体等多种方式、千方百计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有日本右翼文化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首任会长、日本右翼历史观的集大成者、电器通信大学名誉教授西尾干二。这些个案对象都是在日本一般读者中有着很高知名度的，乃至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学者文人，是典型的“知识右翼”。这些人的思想与著作在当代日本思想史、言论史上，都将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对其进行透彻的剖析和批判，可收以一当十之效。

第十、第十一章，对右翼历史观的扩散与弥漫的方式与途径加以研究。指出日本右翼历史观不仅仅是学者文人圈子里的东西，右翼文人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将其右翼史观纳入现行教育体制，编纂和出版他们所理想的历史教科书，而右翼历史观的“教科书化”意味着右翼历史观已经通过中学历史教科书进入了日本的国家教育体制中，并对同类历史教科书产生了污染与影响；另外，小林善纪宣扬右翼历史观的政论漫画集《战争论》和《台湾论》等成为畅销书，意味着右翼文人已经找到了将右翼历史观加以通俗化的有效方式和途径，并以此加快了右翼历史观的弥漫与扩散。

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在右翼历史观与现实问题的交接点上，研究右翼历史观所生发的一系列连带问题。其中包括：右翼文人

鼓噪的靖国神社参拜“正当”论问题、右翼文人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逆袭”(反唇相讥)及“中国反日”论的问题、右翼的历史观所决定的中国历史观及中国现实观问题。这三个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历史观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上的右翼言论加以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右翼历史观对日本现实、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

本书在对日本右翼历史观进行批判研究时,十分注意“批判”与“研究”的统一。“批判”是作者预设的既定立场,包含着作者的倾向性。人文科学研究都有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不能建立在党派的、意识形态的狭隘立场上,不能用“左翼”的立场否决“右翼”的立场,否则就会是使研究陷入“左翼”、“右翼”各执一端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本书作者采取的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中国人的立场,是客观的历史主义立场,必须确保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与逻辑的基础上,让历史事实的客观性、让人类正义的普遍价值观来决定“批判研究”的科学性,运用实证的、科学的历史观,批判右翼的反科学的、主观臆断的历史观。右翼历史观的反科学性,常常表现为语言暴力、虚浮无据、过甚其词、走火偏激、耸人听闻,以致漏洞百出,逻辑混乱。因此,科学的论理与逻辑也是批判研究右翼历史观的有效方法。

本书对右翼历史观的研究可以表明,当代右翼历史观的猖獗,与日本试图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由“战败国”转变为“普通国家”的总体“国家改造”战略密切相关,对侵略战争史的歪曲和美化是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必然环节,并导致了以“知识右翼”为主体的右翼历史观的泛滥。本来,日本成为“政治

大国”和“普通国家”的愿望可以理解,无可厚非,但这必须建立在对历史问题的彻底清算的基础上。对子孙后代进行和平可贵、侵略可耻的教育,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道德底线,更是一个曾经拥有侵略历史的国家的应有责任和义务,是防止重蹈侵略战争覆辙的必要条件。遗憾的是,日本右翼及右翼历史观却以如实承认侵略历史为耻,以抹杀侵略历史为荣,对侵略历史不认账、不反省、不道歉、不赔偿、不求得被害邻国的谅解,却大张旗鼓、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美化侵略、蓄意刺激被害国国民的感情,一再对被害国国民进行文化挑衅,直接或间接地宣扬“侵略有理”,这决不是通向“普通国家”的正道。日本右翼在历史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看似精明,实则愚蠢,一如当年日本军部政府在战术上的高明、战略上的拙劣。试想,日本如不取信于世界、不取信于邻国,如何成为真正的“普通国家”,更遑论“政治大国”!

最后还应该指出,上述的知识右翼或右翼文人相对于一亿三千万日本国民而言,只是极少数,他们的言论当然决不等于全体日本国民的言论。然而,在日本近现代史上,像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北一辉、大川周明那样的右翼文人也是极少数,但却能左右和影响某一时代日本舆论的走向乃至政府当局的决策。何况如今的日本右翼言论的盛行、右翼书刊的大量发行,有着不可忽视的时代气候、政治背景与社会土壤,有着强大的政治支持与经济后盾,对日本侵略历史和中日关系史知之不多的普通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也有不少人对于右翼思想言论表示赞同和共鸣,这是十分值得警觉的。当然,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战后的日本建立了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体制,思想和言论是多元化的。在右翼